

踏歌行

纸上还乡

郑建伟

仿佛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血脉里的故乡
脐带里流淌的血液
在某一时刻
总会打破心中的藩篱
朝着远方的某种精神指向
义无反顾而去

一部村庄的兴衰史
穿越破旧屋檐的流水声
早已深深刻满
梧桐树日渐衰老的容颜

或许,早就应该懂得
一把闲置在墙上的锄头
对土地的如何深情依恋
当弥足珍贵的乡音
与一杯杯自酿的农家米酒
互诉衷肠成为知己
我把这些年漂泊的忧伤和痛苦
牵挂和不安,一饮而尽

迟到的敬仰

张学勤

我与妻子都是当年的知青,相识于农村广阔天地。第一次上门去见未来的丈人,自然准备着聆听他的教诲,接受他的盘问。见了面后,衣着朴素的丈人既无盘问也无教诲,只是微笑地请我落座。看得出,未来的丈人热情敦厚但不善言辞。

那时,年轻人的工资不高,办一场普通婚宴也是一笔不菲的花销,所以,我曾准备迟几年结婚。然而,我的丈人却早已为女儿预定了婚期,并支付了整场婚宴的全部费用。

丈人平时言语不多,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们年轻人对待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他几乎不谈自己的往事,我从丈母娘处曾获得如下一些零碎信息:

解放前,丈人曾是铁工厂学徒,没有读过书,所以不识字。解放后,参加了扫盲班,才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却爱钻研机器设备,他年轻时曾在厂里搞过技术革新,获过奖,后来,就成了厂里的中层干部。但是,他在办公室坐不住,上班时总是喜欢待在车间里机器旁,所以,衣服上总是沾有油渍。

丈母娘说:“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大家都叫他‘韩师傅’。”

不过,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的大名——韩小狗!丈母娘解释说:“从前的贫苦人家,担心养不大自己的孩子,往往给小孩取一个‘小狗’或‘小猫’的名字,希望小孩也能像小狗、小猫一样不易得病,容易存活。”

话虽然说得很明白,也颇有理,但是,这一大名还是让我与热心敦厚的丈人之间拉开了些许距离,我当然不敢当面叫他一声“小狗丈人”,也怕听到有人喊他“小狗师傅”。1990年,我的丈人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8岁。我为失去一位慈祥敦厚的长者而泪流满面……

墓碑上,丈人慈祥笑容的照片旁,早已刻上了“韩小狗”的大名,我顿时有了不安的感觉——这不是在侮辱人吗?我在心中不禁暗暗发问:“岳父大人,您生前为何不改一下自己的名字呢?”

20年后,我退休开始投身于地方文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2019年,杭州市政协文史委推出一项文史课题——《杭州七十年》,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这70年杭州发生的大事要事。我有幸参与其中,在查阅上世纪60年代的报刊资料时,我突然发现1960年2月25日《浙江日报》头版报眼赫然登载着我丈人的照片,照片下是一篇1000余字的新闻,黑体大标题是《韩小狗敢想敢闯风格高》。由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一时竟呆住了……

细读新闻,原来是讲述我丈人在杭州纺织机械厂“彻夜大闹革新”,改进机器设备的先进事迹。新闻下方还配发了一则1700字的评论《闯劲颂》,文中有如下颂词:

韩小狗,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工人,在党发出了向机械化、自动化进军的号召以后,带动全组工人,车间扎营,昼夜奋战,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仅仅三天时间,就使全组十台机床全部实现了半自动化,生产效率猛增一倍以上,而且一人可以看管两台机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简直是奇迹!

此后,我便有目标地开始检索,发现《浙江日报》上有关我丈人的新闻还不少,仅标题中有“韩小狗”的新闻就有:《韩小狗助人为乐》(1960年3月23日)、《韩小狗又创新刀具》(1960年7月1日)、《韩小狗带领工人攻破质量关》(1961年5月1日)。

市级党报上有关我丈人的报道更多,1956年5月3日的《杭州日报》刊登杭州市第二批青年生产突击手简要事迹,有关我丈人的简要事迹如下:

韩小狗,公私合营杭州机械制造厂车工。生产一贯认真负责,自2月份来,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产量完成行政指标166.4%,正品率比计划提高2.3%。

在《杭州日报》上,我丈人的先进事迹还被改编成长篇评话故事《冷拉机过关记》,开场有这样一段介绍:

念罢开场诗,讲一段共产党员韩小狗带领同志们大战冷拉机试车关的故事。你道韩小狗是何等样人?此人生就方盘脸,阔额头,双眼炯炯有神,讲话句句有力。他原是杭州纺织机械制造厂的车工,在技术革命运动中,改革车床屡建奇功,曾多次评为省、市先进生产者……(1962年2月21日《杭州日报》第三版)

读完这一系列的文章,我对丈人的大名“韩小狗”肃然起敬。是啊!人的名字固然有雅俗之分,但是,名字能否闪亮发光完全取决于人的品行啊!丈人,您早已为自己的大名注入了金子般的光辉。

我问妻子:“这些新闻报道你们难道都不知道?”一脸茫然的妻子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报纸,家中没有任何报纸收藏,父母生前也都没有提起过。只知道父亲早年曾是厂里的先进模范,具体情况我们都不清楚呀。”

丈人,您寡言少语的背后,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这笔刻着“韩小狗”闪光名字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后代汲取正能量的传家宝。怀念慈父,敬仰模范。我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未能当面向您倾吐敬仰之情。

智者曾宓

张捷



《讲真话》

来造境,一丘一壑一老翁,一花一木一闲人,或古道西风瘦马,或危崖枯木白练,气格独立,境界清寂,跳脱尘俗,常常带有以物喻人的精神指向。他的画面概括、洗练、单纯。笔墨涩重率真,沉郁而朴茂;意境幽奇深邃,古厚而高华。用笔肆意,疾而不滑;用墨丰厚,浑而不浊;用色鲜亮,艳而不俗。时而干裂秋风,大漠皓月;时而润含春雨,小村夕阳。而曾宓先生的人物画和花鸟画与其山水画的表达情感恰好相反,由冷寂转为热烈,情感饱满,诙谐有趣,题材多取自日常生活之所见所闻,市井犬马、歌舞声色、修瓦踢球、遛鸟读报、书斋酒肆、恋人香客、睡猫裸女、寒雁雄鸡、竹石牡丹,这些茶余饭后的闲情偶寄,散淡随性而生机盎然。画面构思巧妙,形式新颖,用笔挥洒自如,旨在以意取象,不在状物描摹,着墨不多而意趣横生。

曾宓先生擅书,尤精行书小字,他深知书画同源、同理、同构的原理,援书入画,画以书进,两者相辅相成,辉映成趣,他喜欢在画面上作长跋,而后在其深重的墨色上钐盖多枚鲜红的印章,构成极富形式感的图式语言;而其独立意义上的书法作品,更是花样迭出,表现手法出人意料,书写方式别出心裁,文字内容与形式语言高度一致,以宿墨、淡墨硬笔直入,或繁密文字以包围法回拢小册扉页,满而不塞具有文人书卷之气;或以手界划朱丝栏作简牍之状,再进行不拘一格的书写。书法文字内容多为文人警句名言、画理画论,时而以民间谚语、流行歌词入书。

曾宓先生是一位充满智性和写意精神的文人画家,强调学养品格,讲究笔墨情趣,尊崇自然法则。道由技生、艺理并重是曾宓先生独创风格和本体精神的基石,他骨子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极其强调个人意志和艺术表现力的同时又尊重自己艺术准则。在宿墨的运用上虽然吸收了黄宾虹的某些技法,但他力求不与人同,我用我法,尤其是将埃墨、宿墨和水直落,泼写结合,积破并用,把宿墨、渍墨、积墨、泼墨、破墨等墨法一起混合运用,又辅之以水渍法、冲写法、背敷法等,并把宿墨肌理的偶然性变成必然性,有效地使整个画面充盈着一股神秘而迷蒙的氤氲气息,宿墨的层次更为丰富,变化更加多端,拓展与深化了宿墨的表现力,这是他在墨法上的发展和贡献。在画面构成上,他以烘托衬托手法完善画面的背景和边角的处理,并以水墨的纵横擦抹和混沌交错表现出明晦和光感效果,这些手法的使用,使他的画面构成更为新颖,拉开了与传统绘画的距离,在视觉感知上更具现代意味和独立精神。

有生活情趣的老顽童

熟悉曾宓的人都知道,除了读书、写字、画画是他的常态,其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或许是孤寂独处的秉性与曲高和寡的距离,他不善与难以交心的人打交道,只和意趣

2022年9月28日

(本文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本版配图均为曾宓先生作品)



《我的鞋》



《黄土高坡》



《天和鸣》



《春到人间》

特稿

我与曾宓先生可谓忘年之交,我们相差整整三十岁,我在浙江画院工作的九年时间里,曾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令我尊重敬仰,无论是做人还是画画,先生让我懂得如何明是非、辨优劣,每次促膝交谈,先生总是言简意赅,义理精深而大道至简,使我获益良多。曾宓先生是当代中国画坛不可复制的、纯粹的文人画家,他的身上传递出中国文人的特有品质和独立人格。悉闻先生弃舟登岸,仙归道山,脑海中一身洁白装束的智者已渐行渐远,而留给后人的却是一幅幅充盈诗性和黝黑深邃的水墨灵魂,这一白一黑的阴阳相隔,让我顿觉悲涌心来,感慨不已。

一直在路上的求道者

曾宓先生1933年出生于福建福州,195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专攻山水画专业。1962年浙江美术学院科班毕业,被分配到杭州王星记扇厂从事书画扇面设计工作。1984年调入浙江画院为专职画师直至终老。以上看似简短的学习与工作履历,却蕴含着曾宓先生不平凡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在我心中,他是一位甘于寂寞而自我觉行的长者,他将一生的笔墨修为当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始终坚信“于笔墨不到之处立言”的人生修为。他耳查目明,讷言敏行;学理贯通,道术相济,毕生躬耕不辍,努力探寻当代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之路。上世纪90年代初,他送我一本著作《中国写意画构成法则》,一度成了我探究中国画写理的法门。在我本科毕业而工作没有着落之时,曾先生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来激励我不要气馁,并为我到处打听求师问道,亲自写信力荐。先生风范,后世迄今难忘。

山水画是因而异的风景,是世界观的山水,更是求道者的山水。曾先生将艺术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行道、体道和悟道中与天地万物相往来,“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于心,布乎四肢,形乎动静。”求学时,对他影响最深刻的是三个人,首先是顾坤伯先生,顾先生细腻的情感与笔致,以及深厚的笔墨功底,使曾宓先生在范式与接纳的古法传习中去深入挖掘传统。我曾见过一幅曾先生1960年临摹石涛的《云到江南图》,可以说是形神兼得而神明迥肖,而石涛的“一画论”和“墨团里黑团团,黑墨团里天地宽”的墨法变化更是对产生重要影响。1961年他的《临任伯年人物》也是神完气足,形质俱应,对他后来的人物题材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位便是黄宾虹先生,他所构建的“五笔、七墨”理论和朴厚浑莽的气格,是曾宓先生得以鉴借和生发的活水源头,早在本科期间,曾先生就拟过酷似翁翁的习作,如1961年的《浙美习作》、1962年的《秋山萧寺》。黄宾虹观照自然、落墨写心的“观物与体象”的元二法则,深深印刻在曾宓先生的艺术思想之中,其在《画人杂说集》中写道:“在艺术的欣赏中崇尚自然的、和谐的、纯朴的追求,是出于人情本能的归宿,也是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所以自然造物启动你想象的闸门,表现你个性思辨的创作流程之时,不要走得太远。”第三位是林风眠先生,曾先生是一位有着宏阔学术视野的画家,以自己一以贯之的艺术实践,致力于中国画的变革与创新,以多元而意象的人文情怀投入到自我的生命体验当中,笔墨只是他寄托喜怒哀乐的方寸。记得我借住三台山农民房时,他曾向我借过瓦西里·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等欧美艺术理论书籍,当时我很是费解,一位“老夫子”怎么会对接抽象艺术理论、符号学甚至格式塔心理学感兴趣?我想,他的智慧生成来自博约践行和融会贯通,他在汲取黄宾虹“苍而润之”的宿墨法的同时有意削弱了用笔“一波三折”的墨线,而借鉴林风眠“直抒胸臆”相对平直与单纯的行笔,以及浓郁亮丽的色块融入黝黑的画面,色墨无碍,相得益彰,别开生面,境界弥开,其鲜明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

在曾宓先生的拟古与变法、古今与中外、体悟与超越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求道者知往鉴来的艺术轨迹和品格追求。曾宓先生曾说:“如果没有兴趣和天赋不要染指艺术。”他将艺术当作自己的信仰,执一事而终一生,一贯秉承着坚守、自信、包容、开放的中国画学思想,毕其一生探索至臻至美的艺术之境,从未停歇行进的脚步,他始终于知行合一中认知艺术本源、于日积月累中形成心目中的、于四季轮回中体验生命活力。

有独立精神的文人画家

王鲁湘在其《水墨诗人曾宓》一文中写道:“我所面对的这位画家很特别,他是一位水墨画家,长期生活在江南,但又不是我们熟悉的传统水墨画家,可以说在意象表现和画面构成上,他与传统相去甚远。但是,如果你简单地把他归类为新派水墨画家,却又容易不经意之间切断他同水墨传统极为深广的精神贯通和文脉关联,会极其浅薄地谈论他对水墨绘画的种种创新。”

曾宓先生是一位有态度的画家,作品往往以单纯的笔墨语言来表现习以为常的题材,平淡天真,质朴无华,读其画作如与君聊天散步,信手拈来,下笔成趣。他的山水画多以中近景